

曾慶榴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廣州國民政府

嶺南文庫編輯委員會

廣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

合編

岭南文库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叶选平 卢钟鹤 任仲夷 杨应彬 杨资元
李兰芳 陈越平 林 若 黄文俞 黄华华
谢 非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黄 浩

主 编：于幼军

副主编：刘斯奋 岑 桑 (执行) 萧如川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幼军	卞恩才	冯伯秋	庄 昭
刘扳盛	刘斯奋	朱仲南	麦英豪
李 翀	李权时	李达强	李锦全
岑 桑	张 磊	陈俊年	陈海烈
陈胜彝	洪志军	胡守为	饶芃子
梁 钊	梁渭雄	萧如川	曾牧野
曾宪志	廖晓勉	颜泽贤	

“岭南文库”前言

广东一隅，史称岭南。岭南文化，源远流长。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千百年来，为华夏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了绚丽多彩、凝重深厚的篇章。

进入19世纪的南粤，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摇篮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启蒙之地，继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和根据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斗争中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用鲜血写下了无数彪炳千秋的史诗。业绩煌煌，理当镌刻青史、流芳久远。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枯拉朽，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卓有建树。当中国社会跨进20世纪80年代这一全新的历史阶段，广东作为国

家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省区，被置于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发展的前沿，沿改革、开放、探索之路突飞猛进；历十年艰辛，轰轰烈烈，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空前伟绩。岭南大地，勃勃生机，繁花争簇，硕果累累。

际此历史嬗变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尤其是广东人民，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岭南、研究岭南、回顾岭南的风云变幻，探寻岭南的历史走向，从而更有利于建设岭南。我们编辑出版“岭南文库”的目的，就在于予学人以展示其研究成果之园地，并帮助广大读者系统地了解岭南的历史文化，认识其过去和现在，从而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高瞻远瞩，继往开来。

“岭南文库”涵盖有关岭南（广东以及与广东在历史上、地理上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岭南地域）的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并从历代有关岭南之名著中选择若干为读者所需的典籍，编校注释，选粹重印。个别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译著，亦在选辑之列。

“岭南文库”书目为 350 种左右，计划在五至七年内将主要门类的重点书目基本出齐，以后陆续补充，使之逐渐成为一套较为齐全的地域性百科学库，并作为一份有价值的文化积累，在祖国文化宝库中占一席之地。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元旦

目 录

序	丁守和 1
绪 论	1
第一章 大元帅府	8
一、大元帅回粤	8
二、大元帅府的建立	12
三、军事活动	17
四、南北对峙	21
五、粤政治理	24
六、突进与飞跃	30
第二章 大元帅府与国共合作	42
一、两党“姻缘”	42
二、中央局迁粤	48
三、改组“试验”	53
四、合作形成	58
五、“暗潮”涌动	65
六、维护合作	70

七、斗争的继续	75
第三章 政府保护下的农民运动	83
一、“农运”摇篮——农讲所	83
二、农民运动的兴起	86
三、全面发展	91
四、迅猛高涨	94
第四章 “党军”的创立	103
一、黄埔军校的创办	103
二、革命军中坚	108
三、积极的探索与尝试	119
第五章 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	126
一、孙中山的“党治”思想	126
二、国民党中央关于改组帅府的决定	130
三、国民政府的成立	135
四、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的成立	142
五、东江及各地行政公署的建立	146
第六章 南北关系、对外关系与“党治”路线	154
一、南北关系	154
二、对外关系	160
三、统一军政、民政、财政	163
四、国民党党务工作的发展	172
五、中共广东区委的活动	177
第七章 统一广东诸役	185
一、平定商团	185

二、第一次东征	192
三、驱逐杨、刘	203
四、第二次东征	210
五、“熊克武事件”	227
六、南征	230
第八章 国民政府与省港大罢工	246
一、广东工人运动的兴起	246
二、省港大罢工的爆发	250
三、罢工委员会和工人纠察队的成立	255
四、国民政府对省港罢工的支持	262
五、省港罢工前期的斗争	266
六、罢工运动的坚持和发展	270
第九章 国民党的分化与国民政府的危机	276
一、最高权力之争	276
二、“廖案”与汪、蒋合作	281
三、“戴季陶主义”	294
四、西山会议	303
五、广州“二大”	315
六、上海“二大”	326
第十章 “军权”向“党权”、“政权”的挑战	333
一、从“中派”人物到“铁腕”人物	333
二、中山舰事件	342
三、蒋介石：取汪自代	352
四、鲍罗廷：弃汪联蒋	359

五、整理党务案	364
第十一章 国民政府兴师北伐	371
一、北伐的酝酿	371
二、一场风波	380
三、北伐途次	385
四、广东人民支援北伐	391
第十二章 国民政府迁移武汉	397
一、广州政象：扑朔迷离	397
二、“迎汪”复职	402
三、“迁都之争”	408
四、“党权”与“军权”的再较量	417
五、国民政府北迁后的广东	424
结束语	434
后 记	441

序

丁守和

在广州，从 1917 年至 1927 年的十年之间，中国国民党几次在此建立过政权。计有：1917 年，“护法”国会议员南下，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陆海军大元帅，在广州设立中华民国军政府；1920 年，粤军自闽返粤，孙中山恢复军政府，并于翌年被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为大总统，在广州设立中华民国政府；1923 年，孙中山组织“讨贼军”，驱逐了陈炯明，在广州设立大元帅大本营（称大元帅府）；孙中山逝世后，大本营改组，于 1925 年 7 月在广州设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称广州国民政府）。这十年，广州不但屡次设政开府，而且发生过许多影响久远的大事，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和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就是在这时期发生的。这无疑是较为重要和颇有特色的一段历史。不少从事中华民国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或孙中山研究的人，都注意研究这十年的历史，这

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曾庆榴的《广州国民政府》，就是研究这一时期广州革命政权的一本专著。作者长期钻研这一专题，积数年之功而成此书。我对这本书的出版，感到由衷的欣喜。

这本书主要论述孙中山大元帅府和广州国民政府这两个政府的成立、组织机构、内政外交以及各种政权行为。作为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政治信念、政权理论、治理主张的体现，作为中国国民党从孙中山时代向蒋介石时代过渡的纽带，“帅府”、“国府”这两个互相连接的政府，其政权行为相应表现出复杂的状况，以小政府驾御大革命、军政合一、“党治”初步以及多色彩、多取向等特点而见称于历史。本书作者遵循“从史实求史识”的原则，通过对史料的考订、整理和对史事的概述，着重揭示了这两个政府的政权形式从总统府、大元帅府（军政合一）到国民政府（以党治政）的演变；权力格局从孙中山大元帅一长制、胡汉民的“代帅制”、汪（精卫）蒋（介石）合作制到蒋介石独裁制的演变；军事运动从黄埔建军、统一军政、统一广东、统一两广到兴师北伐的演变；工农革命运动从兴起、发展、高涨到遭受挫折的演变；内政方针从“护法”、军事廓清到革命治理的演变，从“军政”向“训政”的过渡；国共两党的关系从建立合作、维护合作到两党分裂的演变；南北关系从“和平统一”、两会（国民会议、善后会议）之争到以革命战争实现全国统一的演变，等等。由此观之，本书所叙史事之时间跨度虽与我们常说的“大革命时期”相近，但作者显然是有明确的着

墨之点和中心论题的。

这本书没有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它放到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加以分析。国民党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党，这个党从孙中山时代转到蒋介石时代，已经从一个为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而奋斗的党，蜕变成为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的障碍。作者表明，他是将所述两个政府存在的时期，作为国民党这种蜕变的始发点来考察的。作者结合历史发展的实际，认真分析了国民党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分析了“党权”、“政权”、“军权”三者的状况和问题，力图揭示国民党发生蜕变的隐因和先兆。应该说，这是一本史料较为丰富并具有个人见解的书；是一本不但对研究那个专题，而且对研究全部中国政治史都有参考意义的著作。

本书著者曾庆榴，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前数年，当他担任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主管该校科研工作时，我曾应他的邀请，到该校讲了《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与创新》一课。随后，又与他一起，到孙中山的故乡——中山市，参加“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的学术讨论会。相处十多天，谈了许多话，并读了他所写的《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一书以及论“变通”、论“和”的文化意蕴等几篇谈传统文化的文章。通过这些交往，我感到庆榴君是一位相当勤奋而有一定功力的学者，不但熟悉各种史籍，钻研过许多有关史学理论、治史方法的问题，而且对传统文化，也有所接触和思考。当时，庆榴君告

诉我，他主要研究国民革命、国共关系、南北关系和南方政权等问题，正在写一本关于广州国民政府的书。他对我谈了他的一些观点和写作此书的构想。我认为这本书值得写，也适合于由他来写，遂鼓励他趁年富力强之时，克服困难、排除干扰、专心致志地把书写成；并允以书成之日，为之撰序。现在，这本书终于写出来了。我也写了这篇短文，为之介绍，并致祝贺之忱。

是为序。

一九九六年春节

绪 论

本书所称广州国民政府，系指 1925 年 7 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建立的政权。1931 年 5 月由某些国民党人所设立的“广州国民政府”，以及 1949 年夏由南京迁至广州的“国民政府”，本书未予论列。广州国民政府是由 1923 年建立的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大元帅府）发展并改组而来的，这两个政权自有其内在的和割不断的联系，故本书对大元帅府的组织及其主要的活动，也作了必要的叙述。

孙中山是一个具有伟大的政治抱负，有系统的政治思想、政权理论和治理主张的革命家；而当时的中国国民党，经过改组和实行国共合作，进入了兴盛时期（也是一个特殊的和处在转折关头的时期），在党务及其他方面得到长足的发展。大元帅府和国民政府，正是作为孙中山、国民党的政治思想和政权理论的产物，并初次以政党的力量改造社会、管理国家的形象，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之上的。这个政权的特色，一是小政府，政权规模小，机构

不完善，辖治区域不广，但却驾御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二是多色彩，其政权行为总的来说体现了国民党的革命主张，但也反映了各种复杂的关系和尖锐的矛盾，从中透视出传统与近代、中国与外国、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与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政治思想和政权观念的冲撞，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政治产生复杂的影响；三是多取向，各种政治观念和政治势力影响着处在十字路口的国民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大元帅府和广州国民政府，是中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之后，在北洋军阀政权大开历史倒车的情况下，坚持民主政治方向的开拓；是辛亥革命事业的继续和孙中山亲手栽培的希望之树。一贯以来，许多政治家、理论家和史学家，留意于研究这段历史，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

本书着重叙述大元帅府和国民政府的成立、组织机构、内政外交以及各种政权行为。著者在笔削史事、提要勾弦之时，力图对如下几点，有所阐明：

一、政权形式的演变。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是以军事机关行使行政权力，表现为军政一体化；而国民政府是以以党治政的姿态出现的，但也具有明显的党政一体化的色彩。在当时来说，“军政”和“党治”这两种形式的选择均不是偶然的，从“军政”到“党治”，无疑还是一个进步。历史的启迪仅在于，军队、政党与政权的关系，是必须按一定的原则来理顺的；军队、政党对于政权的作用和影响，显然也只有放在适当的位置和角度，才能对政治的修明和社会的进步，起到推动的作用。

二、权力格局的演变。大元帅府实行孙中山大元帅一长制；孙中山北上，由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权，孙中山死后仍以胡为“代帅”；至国民政府成立，胡的“代帅”制，为汪（精卫）蒋（介石）合作体制（名义上为“合议制”）所取代；中山舰事件发生，汪蒋合作制逐步演变为蒋的独裁制。孙中山逝世后，围绕国民党、国民政府最高权力的继承问题，胡、汪、蒋之间，进行了几度较量，结果表现为上述数度之更迭。这几度较量，是十分微妙而又极其尖锐复杂的，是以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权力倾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说有“近代”色彩的话，那就是这种角逐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政权”、“党权”、“军权”三者的冲突，竞技者各以政府、政党、军队的作用和各自的实力，不断在权力天平上加重自己的砝码。而蒋介石则凭借他多元地扩张起来的军事实力，同胡、汪斗法，并最终以其“军权”，挫败了胡、汪的“政权”和“党权”。这里并没有透露出在革除封建帝制、实行共和制度之后，在权力授予、交接问题上的民主气息；而只是说明，国民党的改组不彻底的。它的许多头面人物，即如胡、汪、蒋等，未能以改组所体现的革命精神和民主原则，去对待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重大问题，而是目中无党（国民党），不受党章、党的法规和党的组织原则的约束，各显神通地以自己的手腕，去排除异己势力，觊觎最高权力。这严重抵消了国民党、国民政府的革命影响，导致了党的分裂，并促使这个党不久以后的蜕变。

三、国共关系的演变。联共的问题，是国民党自改组酝

酿以来一直有斗争的问题。孙中山以其博大的胸襟、不同凡响的气度，排除重重阻力，实行国共合作，有效推动了国民党政权的更新、党务的发展和军队的革命化。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排共、反共的气氛骤升，“戴季陶主义”出台，“西山会议”派形成，反对派势力以各种非常手段，将联共问题上的分歧，激变成组织上的公开分裂；并企图以此为突破口，根本改变国民党的政治方向。当时，共产党人从维护国民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按照“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的方针，着重从理论宣传上揭露右派，向右派展开反击，努力维护国共两党的合作。固然，国共关系易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客观形势和两党本身情况的变化，都可能对此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而维护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也是存在的。由于各种原因，在总的趋势上，中共未能抑制并扭转统一战线中的反共分裂倾向；未能将舆论、宣传上的优势，转化成使两党合作得到巩固的实际效果。国共关系的变化，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当然有深刻的影响。历史的启迪又在于，国共合作对两党本身有利，对中国革命有利，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有利。

四、工农运动和“党治”路线。国民党改组之后，实行扶助农工的政策，对工农运动明令予以保护。扶持工农运动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是一项重大的政权行为。共产党人在这种条件下，大力发展工农运动，形成了反抗外来侵略、推翻封建压迫、改革中国社会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而所谓“党治”路线，即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体现，要求

在政权工作中突出党的作用，使政府的政令和各种行政措施，能全面贯彻党的主张和体现党的意志。在当时的条件下，主要是针对政权工作中存在的政令不行、军人乱政和吏治腐败的问题，以三民主义和国民党“一大”的政纲去指导和约束政府的行为，努力实现军政、民政和财政的统一。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党治”的初步实施，说明大元帅府和国民政府是能够与历史潮流共进的革命政权。

五、军事活动。作为在战乱中产生的政权，军事工作无疑是政府的中心工作。大元帅府和国民政府多次发动讨伐地方军阀、保卫工农运动、统一广东和将革命推向全国的战争，主要有两次东征、北伐战争，等等。这是由革命政府发动的、有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积极参加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则是国共两党合作精神和合作成效最生动的体现。国民政府之统一广东和兴师北伐，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威德兼施的结果，既行诸军事之威，又布诸主义之德，军事征伐切实地同革命思想的传播、地方政权的建立和各种政治布施相连结。军事行动之后，更有民气的奋发与工运、农运和其他各项民众运动的勃兴。这是这个政府很有特色的一面。

六、南北关系和对外关系。大元帅府和国民政府偏于广州之一隅，但不能视之为“分裂”势力，更不能将其同“军阀割据”相提并论。近代以来，中国引进西方民主制度，从修宪、开国会、组织政党、成立内阁等入手，忙忙乎乎，似有民治的希望出现。而经过十几年政局动荡与政权更迭，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某些民主共和制度，悉被北洋军阀所践